

苏联史译文选辑



07

陕西师大历史系苏联史研究室

R512.07
21

15025-24

三十年代苏联社会阶级变动的社会学

M·E·纳依捷诺夫

最近几年，出现了一系列历史编纂学的著作，这显示了苏联社会学家在研究整个苏联社会结构变动方面，或者说在研究各个阶级的社会面貌变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①但是，至今还未见到试图阐明苏联社会学怎样解决了科学地理解社会主义类型的苏联社会阶级结构形成过程这一复杂课题的著作。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分析是能够提起一定的科学兴趣的。同时，了解一下年轻的苏联社会学在解决上述课题时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所迈出的最初步伐，也是重要的。在那些年头，已大规模地开展对旧生活深厚基础的破坏，而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的过程中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清楚地显示了新的社会制度的轮廓。一些阶级从苏联社会结构中永远消失了，而另一些社会阶级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社会性质。这种在速度和规模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实际上对社会生活的一切范围的改造，迫切地要求苏联社会学家刻不容缓地了解在城乡、在工农业中、在经济和文化中所产生的社会结局及其后果。

本文试图考察一下，苏联社会学家怎样解决这一课题，还在三十年代，他们对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形成过程，做出了些什么贡献。当然，对三十年代的社会学家来说，要对正在发生的变化进行分析并且还要弄清社会变动的性质，那是不容易的。这首先因为，第一，这种变动带着史无前例的性质；第二，这种变动还未结束。

在分析那些关于苏联社会根本结构变动（这些变动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进军而引起的）的评论和判断的时候，我们首先注意到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和实际工作者的著作。这些著作反映了我们社会的各种结构成分的量变和质变。我们从中选出一批专门研究苏联工人阶级的作品。②

在这些著作中，有些是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的工人阶级状况的分析，而另一些则是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部分年代里工人阶级的社会成分、职业、性别和年龄状况的变化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学家把苏联工人阶级在人数和成分上的一切变化，都同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开展，同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和小商品经济形态，以及彻底消灭资本主义成分联系起来。

在许多著作中，对农业中雇佣劳动的性质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深刻变动作了仔细研究。③这里表现出两种趋势：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雇农差不多完全消失；国营农场、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人人数大为增加。A·普扎诺夫考察了国营农场工人成分的变化



A 100

一九三四年出现了第一部专门分析苏联工人阶级民族成分的作品。^⑤

在许多文章中，论述了在苏联消灭失业现象的问题。^⑥

在所有这些出版物中，都引证了广泛的统计资料，以说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部分年代中，苏联工人阶级首先在数量上发生的变化，其中工业、建筑业和农业工人的数量有了巨大的增长，工人阶级在国内的普通居民中的比重增大了，工人阶级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部门中的作用进一步确立了。

在А·М·潘克拉托娃和В·П·马尔库斯的文章中，论证了研究苏联工人阶级质量变化，特别是它的社会成分变化的必要性。^⑦

研究家们指出，由于大量城市居民，特别是农村青年涌进工业部门，以及工厂工人、农业工人和建筑业工人中的妇女的比重迅速增长，这就使苏联工人阶级急剧地年轻化了。

在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的书籍中，除了局部性的考察和结论外，还可以找到一些涉及苏联无产阶级历史命运的论断。这些论断不仅对于研究苏联工人阶级的历史，而且对于研究整个苏联社会史，都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例如，А·德波林还在一九三〇年就作出了这样的论断：“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已经不是旧字义上的无产阶级了。”^⑧第二年，В·巴里林几乎逐字地重复了这个结论。^⑨而在一九三五年，П·尤金更为果断地声称：“我们已经接近完成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随着阶级的消灭，无产阶级本身将不再是一个阶级了。”^⑩

虽然，在上述论断中，从苏维埃国家的整个工人阶级发展的基本趋势上说，阐述是正确的。但是，应该指出这些论断的作者显然是前进得太快了，大大超越了苏联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

三十年代的社会学家写出了大量专门研究农村社会变动的学术著作。消灭富农阶级的问题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在许多著作中，^⑪充分论证了共产党在农村由限制和排挤资本主义因素的政策转到在全盘集体化的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在一些著作中，^⑫引用了消灭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过程的具体资料。许多研究者分析了在全盘集体化的过程中农民社会出身的改造问题。^⑬

从前的农民和集体农民有什么不同？集体化前的农民和集体农民之间的关系怎样？在三十年代前半期要回答这些问题很不容易，当时农业集体化还没有完成，而集体农庄制度还没有显示出自己的全部优越性。集体农庄庄员之间还保存着某些财产上的不平等，在他们的精神上还没有根除私有制的心理。此外，要解答这些问题，不对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是很困难的，其中象集体农庄的社会经济性质、集团所有制的性质等等。我们要指出，直到二十年代末，关于在无产专政条件下的合作社的性质问题，在经济学家当中还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的全苏第一次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Ю·拉林试图证明，集体农庄乃是过渡类型的经济，它似乎不是社会主义类型的经济，既然是以集团所有制为基础，它的利益就可能同全国性的利益相对抗。虽然这种观点遭到会议参加者的坚决反对，但是，在三十年代初的书籍中可以见到不少类似的见解。不过，随着集体化进程的深入，集体农庄制度越来越显示自己的全部优越性，到三十年代中期，社会学家已在集体农庄是作为社会主义类型

的经济这一点上确立了统一的认识。

集体农庄性质上错误评价的顺利克服，首先是同对社会主义一般所有制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集团所有制的性质的深入研究密切相关。应当指出，对这个问题，甚至全盘集体化已经进入全过程的时候，社会学家们还不明确。譬如，一九三〇年且·卢利叶写道：“在集体农庄里，我们暂时还同生产资料的集团所有制打交道，而不是同全社会所有制打交道。只有在全盘集体化的基础上集体生产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导作用加强和农业经济计划化的基础进一步巩固的条件下，这种农民的集团所有制实际上才能变为社会主义形式的所有制，全体劳动者所有制。”^⑭

在三十年代初，许多经济学家都同意这个观点，尽管在法律的实践上已经使用了“合作社集体所有制”这个专门术语，这就意味着它是公有制，即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种形式。随着集体农庄制度的发展和巩固，把集团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种的看法，已为大家所公认。一九三五年，就连那位且·卢利叶也写道：“生产资料的集体农庄所有制乃是公有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种。”^⑮

关于集团所有制性质问题的解决，对于所有社会科学部门都具有重大意义，现在这些部门开始拥有研究苏联农村在农业集体化中的社会化过程以及在农业集体化中农民的结构变动的理论基础。在没有这个基础的时候，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例如，B·基尔波丁^⑯可以说是首先注意到在农村出现了新的社会等级，但在解答关于农民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问题时出现了很大的矛盾。一方面，他把集体农庄员看作农民中的特殊等级；而另一方面，基于集体农庄员中还存在着财产上的不平等又把他们列入贫农和中农阶级。

正是由于这种前后不一致，米罗诺夫才批评了B·基尔波丁。^⑰米罗诺夫本人在苏联农村中分出无产阶级以及附属于无产阶级的农村贫农阶层、中农和富农。同时他认为：“农村中成长着新的、第四个社会等级——集体农民。”^⑱研究家正是把这个“农村中的新等级”解释为新等级的同时，又指出生产资料公有化是作为这个等级的基本特征。但是，在承认集体农民是新等级以后，他同时又声明：“如果说集体农庄员是半无产阶级的话，那它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半工人。”^⑲如众所知，B·M·列宁认为贫农属于半无产阶级。

后来，M·米罗诺夫的一些原理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例如，且·卢利叶在承认集体农民是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产生的新的社会等级这一前提下，认为它是“由小私有者的农民，向把工农变为统一的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⑳ K·布达也夫在一次发言中宣称：“集体农民是个特殊的阶级，诚然，这是在集体农庄发展过程中正在消失的过渡性的阶级。”^㉑

M·米罗诺夫的另一原理成为形成对集体农民这样一种看法的出发点，即根据这个看法，集体农民是同工人阶级没有差别的。据П·伏列姆勒赫证明，在三十年代初，这种立场在公开的演说中和在高等学校的课堂上都有所反映。^㉒在报刊上，这种观点在T·伊申科^㉓的文章中得到最全面的论述。在该论文中，他坚决反对且·卢利叶企图把集体农民说成是新的阶级。他断言，集体农民当时还具有的这种阶级性的特征，只是一种“残余”。“集体农民是我们经济中新的、社会主义的成分，这一点对集体农民来说，

当时是基本的和决定一切的……集体农民是在农村中形成的社会主义生产者的活生生的典型、范例……因之，无产阶级和集体农民之间的差别，作为两个单独的阶级的特性开始消失着。”²¹

集体农民“工人化”的观点，在报刊上受到坚决的反对。M·科尔涅也夫就是首先起来反对这种观点的一个。他不同意把集体农民作为新阶级的观点，他认为集体农民是农民阶级的一部分，而个体农民则是农民阶级的另一部分（他本人正好忽视了这“两部分农民”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生产资料的占有上）。П·法列姆勒赫虽然承认“集体农民的社会性质现时是由它对生产资料的新关系来确定”，但是，坚决拒绝那种认为集体农民是一个新阶级的观点。同M·科尔涅也夫一样，他认为，集体农民“这是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农民阶级的一部分”。²²

可见，在那些年代，在社会学家中，由于农业集体化而在农民中所引起的社会变动并没有一致的看法。象我们所看到的，他们之间的分歧，是由于对苏联社会发展的前景的不同看法而引起的。他们当中的多数人认为，农民联合在集体农庄、消灭了剥削阶级，一般的阶级差别就消失了。他们未能指出，在农村的小商品生产阶级的消灭过程中，在农业集体化的进程中，其实已逐渐形成了一种以生产资料集团所有制为经济基础的新的社会共同体。尽管这种所有制的形式，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种，但毕竟不同于全民所有制，因此，集体农民既不同于个体农民（这种农民是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联系在一起），也不同于国家企业中的工人（他们在劳动中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全民财产）。那些指出了这个新的社会共同体正在形成的社会学家，当时并没有对它的出现的历史必然性进行深刻的理论上的分析。

在三十年代的著作中，还记载了苏联社会阶级结构中另一个成分——知识分子的深刻社会变动情况。A·E·贝林根据丰富的统计资料，对于知识分子的形成过程，作了有内容的分析。但是，对于知识分子在苏联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这样的重要问题，却以缄默来回避。²³ П·奥里舍夫斯基也认为，各科学部门的专家，文化人和管理人员，他们都出身于工人阶级，仍然是工人阶级的成员，也就是说，实际上否认知识分子有权代表苏联社会独立结构的成分。²⁴

以上著作提出的见解、评价和结论，虽然没有超出某些社会集团的范围，但对研究苏联社会新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形成过程，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为了说明苏联工人阶级、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历史编纂学中一定阶段的特点，他们首先促进了实际资料的积累，而这些资料对于理解整个苏联社会的社会变动，以及揭示社会主义胜利之后的社会发展趋势，是必不可少的。在三十年代后半期出版的著作中，这些资料就被利用上了。在这些著作中包含有对社会主义类型的苏联社会阶级结构形成过程的概括评述。

生活本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迫切要求社会学家科学地做出有根据的评价和结论，以揭示苏联社会的社会化过程的性质。但是，为了顺利地解决这样复杂的任务，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首先应当揭穿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苏联社会发展问题上的反列宁主义的观点。这无论从粉碎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政治观点是开展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先决条件的方面来说，还是从克服右派——托洛茨基分子关于苏联社会的发展观是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解释这一问题的先决条件

的方面来说，都具有原则性的意义。与此相关的，还想提到一些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的出版物。^②

在一九三〇年发生了所谓新阶段的争论。这场争论是由K·O·罗森塔尔发表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的文章（1930年第5期）和他在共产主义科学院的报告引起的。这场争论不仅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而且还有着方法论上的意义。K·O·罗森塔尔指出，从社会意义上说，“新阶段是消灭阶级的阶段”，^③这是因为消灭富农是在这个阶段进行的，而且由于集体化的结果，也消灭了小商品生产，并把它们改造成社会主义农业的劳动者。按照Γ·克鲁敏的说法，“我国的全盘集体化，使贫农和中农转入大规模的社会化农业，并在全盘集体化的基础上消灭了富农，这就意味着铲除了资本主义最深厚的根源，并创造了不能再产生阶级和形成资本主义的条件。”^④

这些观点不仅得到了很多参加讨论的人的赞成，而且也得到了一般社会学家的赞成。当年哲学界的领导人之一A·德波林还在一九三〇年就声明：“我们已向未来进行了一个大跃进，接近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消灭阶级并创造无阶级的社会。”^⑤

当然，上述意见只是对国内发生的深刻改造所引起的社会后果，做的最一般的评论，不过，其中对苏联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反映得却够明确了。这是很显然的，因为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把私人资本排挤出工业，集体化的开展以及在此基础上消灭了最后的剥削阶级——所有这一切，导致阶级的消灭，而阶级的存在是同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

在党的十六次代表大会以后，在社会学家的头脑中出现了这样一些新的概念：如“新经济政策的最后阶段”、“过渡时期的最后阶段”、“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时期”等，他们试图用这样一些概念来综合社会生活各个部门所发生的多方面的变动。这些按其内容来说很复杂的概念，其实质在于承认，苏维埃国家的工人阶级接近解决建立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这个结论既是从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得来的，也是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象他们在三十年代对这个问题所理解的）得来的。

K·布达也夫写道：“我们应当在这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完成全盘集体化和在全国消灭富农的任务，这将基本上消灭我们在经济上多种结构的根源。这将标志着在全国建立起统一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这样我们就初步地基本上完成了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个前途是现实的。实现这些任务将意味着在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建成社会主义社会。”^⑥我们要指出，多数社会学家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阶级的，他们把消灭阶级当作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时期过渡的任务之一。^⑦这种观点在党的十七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中得到反映，决议指出“农村中资本主义的根子彻底摧毁了”，^⑧并承认彻底消灭资本主义成分和一般的阶级，彻底消除产生阶级差别和剥削的根源，以及克服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把国民中的所有劳动者变为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自觉的和积极的建设者——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政治任务。^⑨

十七次代表会议无疑对社会学家理解苏联社会结构变动的过程给了很大的影响。这可以从M·科尔涅也夫、K·布达也夫、Б·巴里林、M·戈尔德贝尔格、И·奥库涅娃、K·奥斯特罗维加诺夫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中看到。虽然在他们的学术著作中，对苏

联社会在开展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社会发展的某些观点，没有从广阔的视野里加以阐述，但是在这些著作中却保存了判断作者们观点的足够资料。

上述社会学家认为，消灭富农、消灭城市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把小生产变为社会主义生产的劳动者——是苏联社会成为无阶级社会的有说服力的证明。至于说到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别，他们把这种差别作为过去在这三部分人之间存在的阶级差别的一种残余来解释。同时认为，在苏联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这些残余将随之消灭。

这样一些不完整的见解，在三十年代中期，就逐渐形成了相当完整的理论。在许多杂志的文章中都阐述了这个理论。一九三六年的五、六月，M·科尔涅也夫、M·米丁、A·斯捷茨基都相继发表了文章。从《在苏联消灭阶级》、《论消灭阶级》^⑤的标题本身就够确切地说明文章的内容了。所有这三篇文章都贯串这样一种思想，即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政治任务已经完成，苏联已变成无阶级的社会。M·科尔涅也夫指出在苏联消灭阶级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二个阶段——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消灭了富农和城市的资本主义成分；第三个阶段——第二个五年计划，在这个期间完成了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把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变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劳动者的过程。M·米丁把十月革命的胜利定为在苏联消灭阶级的开始之日。但是，正如他所写的：“为了完全实现从那时开始的消灭阶级的过程几乎用了二十年的时间。”^⑥

上述作者在认定苏联是无阶级社会的同时，又指出在苏联社会内还存在着工人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的残余，以及工农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别。A·斯捷茨基强调这个思想，即消灭阶级的过程还没有全部完成，当时只是达到了消灭阶级的决定性阶段，只是在这个方向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论文的作者们把苏联社会存在着阶级差别的残余是同两种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国有制和合作社集体所有制联系起来。M·米丁甚至强调要注意问题的方法论一面。他写道：“我们常常忘记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即全民所有制（国有的）和合作社集体所有制之间存在的区别。然而，这是不应该忘记的，因为这对了解我们在消灭阶级的现实中所走过的道路，对了解社会结构，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⑦

Я·别尔曼用专文分析了苏联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所有制。^⑧他仔细考察了苏联社会的最重要的结构成分同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所有制之间的联系。

指出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存在，是苏联社会保存阶级差别的决定性原因，这就标志着苏联社会学取得了无可争辩的成就。因为这就为科学地有根据地解决苏联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创建了理论基础。但是，承认苏联社会是没有阶级的，就限制了利用这个原理的可能性，而在某种情况下还可能曲解这个原理。

认为在社会主义基本建成之后，苏联就成为无阶级的社会的见解，显然是超越了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无需证明，这种观点是不符合社会实际情况的。应该考虑到，其所以产生上述见解，首先是因为苏联在非常短的时期内所发生的社会变动是史无前例的，而且是处在独一无二的情况下在国内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就使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性阶段，解决研究社会过程的任务产生困难，并且要求学者们大胆地创造性地去进行研究。苏联社会学家在大量的局部性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的

成就。但是，他们在试图确立整个苏联社会发展观的基本原则的时候，未能迅速克服关于社会主义的社会面貌和消除阶级差别的道路方面的某些错误的理论原理。例如，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的前半期，社会学家们认为，消灭阶级的任务，要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完全解决，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就要建成无阶级的社会。从这一观点出发，直到三十年代后半期，研究者们对于发生在开展向社会主义进军过程中的苏联社会内的最深刻的变动，还从一般消灭阶级的立场（当时，他们所指的实际上只是消灭同生产资料私有制相联系的那些阶级）来加以评价。不过，在那时，在社会科学中还没有其他阶级观念。这就是苏联社会没有阶级的观点的认识论的根源。其实，这种观点的内在于矛盾成为广泛而科学地探讨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阶级结构形成过程的一种刺激因素。

一九三六年夏天，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宪委员会完成了苏联新宪法草案，并公布让全民讨论。深入研究苏维埃国家的根本法，就要求深刻地理解苏联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其中包括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新宪法的第一条规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工人和农民的国家。这就意味着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没有阶级，那里存在着两个社会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

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在讨论新宪法草案的过程中，比较全面地揭示了苏联工人阶级、集体农民阶级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形成的新的阶级的社会性质。在许多发言中也指出，作为苏联社会的一个阶层的苏联知识分子已经产生了。

这就标志着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新的、真正的科学观点。这个观点的实质就在于，在苏联建成了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苏联的社会成员在社会性质上还不是清一色的群体，他们属于不同的社会阶级，这些阶级不仅与革命前的俄国、甚至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所存在的那些阶级也根本不同。社会主义阶级的形成是在建立清一色社会的道路上所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因为这些阶级之间的界限将愈来愈快地消失。

新见解在苏联社会学中很快确定了。还在一九三七到一九四〇年，在定期出版物上，出现了一系列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论文，在这些论文中，这些新见解被详细地论证和发展了。这些文章的作者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这还不是没有阶级的社会，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保存着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阶级差别。例如П·尤金写道：“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存在就决定，我们还存在着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①

在这些年代的著作中着重指出，苏联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剥削阶级，它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已经消灭了。П·法列姆勒赫、П·尤金和其他一些研究者都用整篇的论文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②

就在上述论文和Л·希彼洛夫、Г·格列泽尔曼、М·米丁和其他人的论文中都把新阶级的存在完全同社会主义的两种所有制联系在一起。Л·希彼洛夫写道：“苏联社会的两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同社会主义两种所有制相适应的，这两个阶级之间的界限将日益消失。”^③评论新阶级的重心很快就转移到考查苏联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之间本质上具有的共同特点上来了。其共同特点既然是两个阶级同社会主义统一的生

产体系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点,两个阶级之间存在的界限,不仅不是对抗的根源,而且在彼此合作的过程中必将消除。И·法列姆勒赫甚至对这个重要主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在他的研究中,在详细分析新阶级的社会性质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说,这个界限消失的过程中,将进一步巩固工人阶级同集体农民之间的牢不可破的联盟。⁴³

这种新观点在M·米丁的一篇有趣的论文中得到最充分的论述。⁴⁴作者不仅研究了新观点的基本原理,而且把“新阶级”看作“新社会中的旧残余”,也就是说,是过去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于工人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残余。他从列宁“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的定义出发,着重指出:“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绝对不是任何旧的阶级差别的痕迹都没有了,绝对不是已经没有阶级了。”⁴⁵

当然,社会主义的阶级之间除了共性之外,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两个阶级是建立在基本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社会主义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国有的和合作社集体所有的)是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之间差别的基础,两个阶级的不同地位是由历史上形成的社会生产体系造成的。它们在社会劳动组织中的作用,以及取得收入的范围和形式都存在着差别。像我们已经指出的,正是这种带有阶级性的差别,决定了这些阶级的社会性质。⁴⁶

社会主义两种形式的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所有制)的共同性质使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亲密起来,使他们的联盟巩固,使他们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由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利益一致,就形成了苏联人民在社会政治上、思想上的牢不可破的团结。

※ ※ ※ ※

我们总结一下。科学地理解社会主义类型的苏联社会阶级结构的形成问题,是对年轻的苏联社会学的严重考验。而整个苏联社会学家都经受了这个考验。尽管当时还没有经过一定的历史间隔(这种间隔可以使研究者全面地看到已发生的变化之真正规模和深度),苏联社会学家不仅能够确定苏联社会各种结构成分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变动,而且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社会主义类型的苏联社会阶级结构的形成问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发展。

这个理论的出现,对苏联社会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意义。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这个思想的影响下,在这个思想的基础上,当年就已经探讨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苏联社会阶级历史的趋势。当时出版的那些著作就证明了这一点。就这样,新观点对专门分析苏联社会全貌或苏联社会个别结构成分的研究发生了有决定意义的影响。И·杜布罗维茨基⁴⁸、И·萨乌廷、И·皮萨列夫和其他人从这个观点出发,对一九三七和一九三九年全苏调查作了总结;作者从这些原理出发,写出了关于研究苏联工人阶级的作品;⁴⁹根据新的探讨精神阐明了苏联农民历史的最重要的阶段,⁵⁰出现了有关苏联知识分子历史的著作,⁵¹根据新原理不仅解释了具体的历史问题,而且也解释了象消灭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这样一些复杂的理论问题。⁵²

在战后时期，在广阔的范围内，开展了研究苏联工人阶级、集体农民和苏联知识分子历史的工作，以及研究在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已经消灭了的那些阶级的工作。在研究的过程中，关于在三十年代中期形成的苏联社会阶级结构的理论更加完善了。这个理论已经成为在广阔的范围内研究历史学和经济学、社会学的依据。在一些最新的著作中，这个理论的一些原理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化和发展，另外一些原理则成为热烈讨论的对象。对这些著作的分析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注：

①А·М·钦奇科夫：《关于苏联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苏联历史编纂学》莫斯科1971年版；В·М·谢隆斯卡娅：《列宁著作和二十——三十年代文献中的阶级结构问题——В·И·列宁与过渡时期苏联社会结构变动的一些问题》莫斯科1973年版；В·И·波库金：《苏联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历史编纂学概要》莫斯科1975年版；М·Е·纳依捷诺夫：《二十年代科学文献中苏联社会结构的变化》——《莫斯科大学学报》历史丛书1975年第1期；以及作者1976年在莫斯科出版的《1917年10月——1970年苏联社会结构的变化》一书的《过渡时期苏联社会阶级结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编纂学的形成与发展》一章；А·Н·弗多文、В·З·德罗彼惹夫：《1917—1940年苏联工人阶级的成长》莫斯科1976年版。

②Ф·К·扎乌佐尔科夫：《苏联工人阶级的社会成分的分析》——《布尔什维克》1929年第22期；А·拉辛：《苏联工厂工人的成分》莫斯科1930年版；以及同一作者《苏联的五全工人》莫斯科1930年版；Я·克瓦沙、Ф·邵夫曼：《苏联工厂工人社会成份的分析》——《工业化通路》1930年第1期；В·雷因：《血统无产者》列宁格勒1930年版；М·阿夫杰因科：《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无产阶级的结构的变化》——《计划经济》1932年6—7期；С·约季弗维奇《新补充的工业无产阶级的成分》——《苏联国民经济》1932年第1—2期；М·哥尔茨曼《新工人的成分》——《突击队员》1932年第3—4期；Н·伊林《列宁格勒新补充的无产阶级的面貌》——《工人运动问题》1933年第10期；М·Т·哥尔茨曼、Л·М·科甘《无产阶级的新老干部》莫斯科1934年版；С·海曼《1928—1934年间苏联无产阶级结构的变动》——《计划》1935年第1期。

③А·卡扎科夫《十月前后农业无产阶级的经济状况》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年版；Я·纳普凯斯《在资本主义国家和在苏联的农业无产阶级》——《Сель, колхоз и зиз》1931；Н·安策洛维奇《在新阶段的苏联农业无产阶级》（上述一书的序言）。

④А·普扎诺夫《国营农场工人的成分》——《苏联国民经济》1932年第1—2期。

⑤Л·辛格尔《苏联无产阶级的民族成分》莫斯科1934年版。

⑥И·伊万诺夫《失业现象的消灭与干部的培养》——《苏联建设》1930年第12期；И·扎罗姆斯基《消灭失业现象和我们在劳动部门的任务》——《工业化道路》1930年第2期；С·吉姆美尔弗尔特《在苏联消灭失业现象和干部问题》——《经济问

题》1931年第4期。

⑦A·M·潘克拉托娃《无产阶级史的研究问题》——《苏联无产阶级的历史》1930年第1期；B·И·马尔库斯《关于研究苏联无产阶级社会成分的方法问题》——同上第2期。

⑧A·德波林《社会主义建设与我们理论战线上的任务》——《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30年第5期第19页。

⑨B·巴里林《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完成》——《经济问题》1931年第5期。

⑩П·尤金《社会主义和民主》——《布尔什维克》1935年第16期第33页。

⑪И·B·斯大林《论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2卷；P·И·埃赫《消灭富农阶级》西伯利亚边区1930年版；M·B·耶里扎罗夫《消灭富农阶级》莫斯科1930年版；Ф·И·科舍列夫《消灭富农阶级》莫斯科1930年版。

⑫H·威尔逊尼法夫《在全盘集体化的道路上和消灭富农阶级》——《布尔什维克》1930年第13—14期；A·安加罗夫《农村苏维埃与消灭富农阶级》——《布尔什维克》1930年第6期；C·雷金《富农财产的没收及其策略》——《布尔什维克》1930年第13—14期。

⑬M·弗拉索夫《列宁的合作制计划与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年版；E·H·伊林《苏联的集体农庄》莫斯科1930年版；M·克拉也夫《社会主义在农业中的胜利》——《计划经济》1932年第6—7期；Я·尼库利赫《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莫斯科1934年版；Г·科托夫《为列宁的合作制计划而斗争的总结》——《农业社会主义改造》1934年第1期；H·克拉萨文《巩固集体农庄的最初步骤》——《在农业战线上》1934年第12期；A·尼科诺罗夫《从伟大的转变到集体农庄制度的最后的和彻底的胜利》——《布尔什维克》1934年第23—24期。

⑭Д·卢利叶《关于集体化运动的新高潮》——《布尔什维克》1930年第15—16期第4页。

⑮Д·卢利叶《关于消灭城乡对立》——《布尔什维克》1935年第21期第62页。

⑯B·基尔波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下作为社会经济等级的农民》——《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1930年第5期。

⑰M·米罗诺夫《苏联农村的社会等级》——《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1930年第9期。

⑱M·米罗诺夫的上述文章173页。

⑲同上。

⑳《真理报》1931年4月20日。

㉑《经济问题》1931年第5期第156页。

㉒П·法列姆赫《列宁合作制计划与集体农庄制度的胜利》——《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1933年第6期第114页。

㉓T·伊申科《布哈林的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的批判和关于苏联的阶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1931年第4—5期。

⑳同上第58页。

㉑M·科尔涅也夫《第二个五年计划和消灭阶级》莫斯科1932年版。

㉒П·法列姆勒赫上述一书的第112、115页。

㉓A·E·贝林《苏联的专家干部》莫斯科1935年版。

㉔П·奥里舍夫斯基《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了工人阶级的面貌——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1935年第1期24页。

㉕И·鲁波尔《关于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根源问题》——《布尔什维克》1929年第18期；A·科申《布哈林的阶级理论及其批评》——《革命与文化》1930年第19—20期；П·格里申《关于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过渡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1930年第9期；《诺文科夫关于托洛茨基主义方法论报告的讨论》——《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1930年37—38册；T·伊申科《布哈林的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批判和关于苏联的阶级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34年第4—5期。

㉖K·O·罗森塔尔《论新阶段》——在共产主义科学院经济组的报告（《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1930年37—38册，第79页。）

㉗Г·克鲁敏《新阶段》——《布尔什维克》1930年第10期，第136页。

㉘A·德波林《社会主义建设与我们理论战线上的任务》——《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30年第五期第8页。

㉙K·布达也夫《苏联正在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经济问题》1931年第1期第18页。

㉚参看M·科尔涅也夫《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消灭阶级》莫斯科1932年版；K·布达也夫《无产阶级专政是苏联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经济问题》1933年第6期；B·巴里林《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布尔什维克》1933年第5期；П·法列姆勒赫《列宁的合作制计划与集体农庄制度的胜利》——《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1933年第6期；M·戈尔德贝尔格、M·奥库涅娃《关于过渡时期的几个问题》——《经济问题》1933年第6期；K·奥斯特罗维加诺夫《斯大林论社会主义时期》——《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1934年第3期；П·尤金《社会主义和民主》——《布尔什维克》1935年第16—17期第33页；A·斯捷茨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1935年第13期以及以下各期。

㉛《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决定汇编》1971年第8版第5卷第34页。

㉜同上第35—36页。

㉝M·科尔涅也夫《在苏联消灭阶级》——《布尔什维克》1936年第9期；M·米丁《论在苏联消灭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全民国家》——《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1936年第5期；A·斯捷茨基《论在苏联消灭阶级》——《布尔什维克》1936年第11期。

㉞M·米丁上述文章的第2页。

㉟同上。

㊱Я·别尔曼《论苏联的所有制形式》——《布尔什维克》1936年第10期。

④ П·尤金《关于在苏联消灭阶级》——《布尔什维克》1937年第22期第50页。

⑤ П·怯列姆勒赫《论在苏联消灭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1936年第11期；П·尤金上文。

⑥ Д·希彼洛夫《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学说》——《经济问题》1940年第5期第74页。

⑦ П·怯列姆勒赫《论苏联阶级界限的消失》——《布尔什维克》1939年第2期。

⑧ М·米丁《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与新社会中的旧残余》——《布尔什维克》1937年第19期。

⑨ 同上第12页。

⑩ 详见М·Е·纳依捷诺夫《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性质问题》——《莫斯科大学学报》历史版1976年第6期。

⑪ Д·杜布罗维茨基《苏联的居民》——《布尔什维克》1938年第15—16期；И·萨乌廷《社会主义国家的居民》——《布尔什维克》1940年第10期；И·皮萨列夫《1939年苏联人口调查的总结》——《经济问题》1940年第7期。

⑫ 《苏联工人阶级》论文集，1937年莫斯科版；И·库兹米诺夫《斯达汉诺夫运动——社会主义竞赛的最高阶段》1940年莫斯科版；Б·马尔库斯《苏联的劳动》1939年莫斯科版。

⑬ Д·卢利叶《社会主义革命与农民》——《布尔什维克》1937年第21期；И·拉普切夫《苏联农民》1939年莫斯科版；А·乌拉里斯基《在农村建设新社会的基本法》——《经济问题》1940年第8期；И·列维塔鲁斯《斯大林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学说》——《经济问题》1940年第3期。

⑭ Е·М·雅罗斯拉夫斯基《论知识分子过去和现在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者和历史工作者》第一册，1939年；Е·А·克列尔《无产阶级革命和苏联知识分子》莫斯科1937年版；Б·瓦林《苏联人民的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1939年第10期；以及他的《十月革命和知识分子》——《历史杂志》1938年第11期；他的《党和国家的黄金储备》——《历史杂志》1939年第6期；И·坦吉特《列宁、斯大林的党和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莫斯科1939年版；М·И·加里宁《论苏联知识分子》莫斯科1933年版；М·米丁《苏联知识分子》——《布尔什维克》1940年第8期；Ф·切尔诺夫《苏联知识分子——新型的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1938年第12期。

⑮ И·德沃尔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38年第10期；М·米尔金《关于把农业劳动变为工业劳动的一种》——《经济问题》1940年第3期；鲁宾·里拉《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莫斯科1939年版。

（杨柳植译自《苏联历史》1979年第1期）

一九四四年的南线

苏联元帅、苏联英雄称号

两次获得者华西列夫斯基

在世界史的年表中，记载着不少很有意义的日子。其中，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占有特殊的地位。为什么说它特殊呢？因为这一天给人类带来了期望已久的令人振奋的消息：在柏林城郊——卡尔斯霍夫斯特，盟国指挥部的代表接受了法西斯德国的无条件投降，妄图独霸世界、奴役并灭绝整个人类的德国法西斯，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为这一消息而欢欣鼓舞的各大洲人民，首先向苏联人民及其军队表示深切的敬意，因为他们在同最危险的敌人的战斗中挑起了主要的担子。

不是在其他作战地区，正是在苏德战场上法西斯集中了主要的兵力和装备。在这场异常激烈和规模空前的战争中，消灭了法西斯德国五百多个师及其反苏仆从国军队一百多个师。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苏联人民是怎样奇迹般地保卫了布列斯特、列宁格勒、莫斯科、基辅、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斯大林格勒、刻赤和诺沃罗西斯克；不会忘记在高加索山前地带和库尔斯克弧形地段所进行的激烈战斗。随着抵抗力量的日益增强，苏军击退了敌人的闪电攻击，然后又以极其强大的进攻力量把法西斯德国消灭在他的剿穴中。

苏联在这一场战争中的伟大胜利，这一世世代代为人景仰的胜利，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这次胜利的深厚根源，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不可战胜的生命力，在于社会政治的坚如磐石和苏联社会思想认识的一致，在于生活在我们祖国大地上的各民族之间的兄弟般的团结，在于工人阶级、集体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牢不可破的联盟。这里应当补充的是，还在于有一支社会主义新型的军队。这支军队在英勇善战及指挥艺术上都远远超过了法西斯侵略军。

赢得这次伟大胜利的最主要原因，是苏联人民有光荣的先锋队——列宁的共产党的领导。在战争开始的最初日子里，党就把国家变成沸腾的军营，党善于把人民多年来积累的毅力、顽强性、耐劳精神和坚强意志引向一个统一的目标——粉碎敌人。党的“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胜敌人”这一激动人心的口号，成为每一个爱国者的座右铭。党中央委员会是掌握这场战争的政治领导和战略领导全部要领的真正司令部。

时间的流逝是淹没不了伟大卫国战争的事件的。许多年过去了，这些洋溢着苏联人民及其战士的英雄主义激情的事件还是那样光辉灿烂，仍然同过去一样鲜明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我想讲一讲一九四四年，即胜利的前一年所发生的几个事件，供《近代和现代史》杂志的读者们参考。一九四四年这一年是把法西斯侵略者全部赶出苏联国土，恢复了从巴伦支海到黑海的苏联国界的标志。这一年，我们的战士开始斗志昂扬地肩负起

了把欧洲人民从希特勒“新秩序”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国际主义使命，在这种“新秩序”面前，就是中世纪最原始的野蛮行为也要黯然失色。

一九四四年初，我们彻底突破了敌人在涅瓦河上对那个以列宁的不朽的名字命名的城市的封锁，并且从占领者手中解放了古老的诺夫哥罗德。几乎就在同时，传来了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地区会战的雷鸣般的轰隆声，苏联武装力量在这次会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紧接着又粉碎了克里木的敌人。上个世纪，俄国海陆军反对英法侵略者，功勋彪炳；而今，苏军在这里进行的战斗又谱写了新的篇章。

解放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地区

在苏军结束了库尔斯克会战，转入总进攻的过程中，当被击溃的德军退向第聂伯河的时候，希特勒曾宣称：“除非第聂伯河的水倒流，俄国人才能攻破它。”他预言，第聂伯河以其辽阔的河面和湍急的流水，及其右岸陡峭起伏的丘陵，形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天然屏障。第聂伯河是号称“东方壁垒”的基本组成部分，它被永久火力网和各种工事牢固地防守着。希特勒以其特有的蛊惑家丑态断言：“从今以后，第聂伯河将是两军的分界线，我要停留在这个边界上，而且永远停留在这里。”②

能呆得下去吗？当时很多关注着苏德战场的外国出版机构都提出了这个合乎情理的问题。大概就是为了引起读者讽刺的微笑，以此来嘲弄纳粹头子妄图稳定“第聂伯河一线”的防御的那些夸夸其谈和胡言乱语，《红星报》才转载了希特勒过去的那个“预言”。

“我们要对斯大林格勒进行突击，并且一定拿下它，这是不容置疑的……我们占领一个地方，就要守住一个地方。”③这是希特勒一九四二年九月三十日向德国国会议员发表的声明。但是，已经到了十月中旬，他们不但没有对斯大林格勒进行突击，反而转入了防御。这年十一月底，当德国第六集团军陷入了埋伏圈的时候，他又郑重地说，决不让全世界目睹德国人在伏尔加河吃败仗的场面。但是，这场面还是出现了：在“第三帝国”的本土上宣布为成千上万死于斯大林格勒废墟的德国士兵哀哀三日。

我们可以读一读希特勒在进攻库尔斯克时所下达命令中的一段话：“如果不发生付事件有重大影响的意外情况的话，那么，这次进攻必使俄国遭到失败。这样，我们就能在短期内从苏联领导者的手中夺得主动权。一九四三年第一次大会战的胜利，将比任何一次一般性的胜利所解决的问题都要重大得多。”④胜利还没有取得，希特勒就虔诚地称它为“世界的火炬”，⑤而其使命就在证明：“对德国军队无论采取什么抵抗手段，都无济于事。”⑥然而，可惜的是这个“火炬”连点燃都还没有来得及。

雄伟的第聂伯河——古代斯拉夫人称之为“斯拉夫季奇河”，意即“荣誉之子”——是同许多为祖国而进行斗争的值得纪念的英雄故事联系在一起的。著名的《伊戈尔远征记》的作者借雅罗斯拉夫娜的哭诉说道，第聂伯河的波涛击穿了横贯波洛韦茨人土地上的重重石山，斯维雅托斯拉夫率领勇士们就在这急流中航行。⑦我同所有的苏联人一样，深深崇敬那些远古先人的功勋。我一点也不想贬低他们爱国主义的业绩。但是，所有这一切在苏维埃战士面前都略逊一筹。老战士们至今还记得，当时，他们没有等待专门的渡河工具，只凭简单的器具就强渡第聂伯河，在敌人的炮击和轰炸下，打退了沿岸敌人的坦克和步兵的猛烈袭击。无数的战友都先后倒在血泊中，而勇士们不怕牺牲，踏着烈士们

的鲜血，仍然一公尺一公尺地向前推进。

希特勒所吹嘘的第聂伯河的防线，在一九四三年底就不存在了。这时，苏军已在第聂伯河西岸有了广阔的基地，可以从这里出发对敌人进行新的打击。希特勒统帅部在十一月和十二月进行的妄图夺回失去阵地的拼命挣扎遭到了失败；没有按照他们的主观愿望恢复深深陷入克里木“口袋”里的军队同陆上的联系。

敌人认为，保住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地区具有特殊的意义；克里沃罗日耶的铁矿、尼科波尔的锰和丰富的粮食资源在德国的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加之，苏军要到达巴尔干非穿过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地区不可。希特勒匪帮明白，要是苏军进入这个地区，就会使得当地亲法西斯的政权解体，从而也就失去了战略原料最重要的产地。所以，为了抵抗苏军的反攻，在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地区德国配备了优势兵力。从普里亚特河到黑海这一地区配置了曼施泰因元帅的“南方”集团军群和克莱斯特元帅的“A”集团军群，共计一百八十万官兵、二千二百多辆坦克和自动火炮、两万一千八百二十门大炮和迫击炮、一千九百六十架战斗机。⑧两个集团军群在一九四四年初动用了在东线的百分之四十的步兵师团、百分之七十二的坦克师团和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战斗机。⑨

让我们来看一看曼施泰因的《失去的胜利》这本回忆录，其中有一篇谈到一九四四年初的战争，标题是《到时候了》。在库尔斯克和第聂伯河战役之后，这一年没有给德国武装部队带来什么愉快的、可聊以自慰的消息。在美丽的草原、森林、湖泊之间，在腊斯登堡城下希特勒的大本营“狼穴”里，他的军事专家们看着东线战场的地图讨论，哪个作战方案更好，反覆地计算投入闪击战的先头部队的人数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而现在，《失去的胜利》一书的作者已经看出了当时形势的必然趋势，他说：“只有守住防线”；现在，“由于德国统帅部的一系列原则性的错误，还债的时候已经到了。”⑩曼施泰因认为，最高统帅部就是希特勒，希特勒是这次惨败的罪魁祸首。根据西德杂志《明镜》周刊证实：“不是旁人，正是曼施泰因比任何人都忠实地执行希特勒的军事政策。他认为希特勒是决不会做错什么事情的，他打算跟自己的‘元首’去冒任何风险。一九三九年八月底，他制定了一个让三个营的德国士兵穿上波兰制服向德国领土进行假袭击的计划。希特勒把这个军事挑衅计划交给希姆莱的保安处去执行。希特勒号召自己的士兵在俄国进行种族战争。”⑪但是，这种搞法意味着给法西斯德国带来不可避免的毁灭。曼施泰因，这位被将军们称为“足智多谋的军师”，就毫无顾忌地劝告希特勒在东方要改弦易辙，进行较为灵活的战争，并且使他相信有必要缔结一个“不分胜负的和约”。希特勒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三月三十日，正当我们在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地区的反攻进入高潮的时候，希特勒撤了曼施泰因“南方”集团军群司令的职，并让他退休。《镜报》周刊讽刺地指出：“谁也不知道，活到八十六岁才寿终正寝的退休者曼施泰因，到底算了过去的老账没有？拒绝执行罪恶命令的普鲁士将军马尔维茨遗囑在其墓志铭上写道：‘他宁受贬黜，因为言听计从就会名誉扫地。’而对埃·冯·曼施泰因先生需要另作别论。”⑫

对于苏联人来说，从一九四四年开始，我们根据力量和物资展开了持续的、强有力的战略范围的进攻战。根据当时复杂的客观情况，苏联统帅部曾预见对敌人的防线首先会从苏德战场的侧翼被突破，这样就可以在北边打破对列宁格勒的包围，打开通向波

罗的海的道路；在南边解放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地区和克里木，打开通向我国边境的道路。

参加南线反击战的有乌克兰的四个方面军，共二百零八万人、一千九百零八辆坦克和自动火炮、三万一千五百三十门大炮和迫击炮、二千三百六十架战斗机。^⑤ 他们的任务是：在进攻的第一阶段，首先消灭伸入第聂伯河方向的德军，局部地消灭“南方”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的力量。

我们相信，在这里，在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地区的敌人一定会被击溃，这一不可动摇的信念不仅仅依靠牢固的物质基础而加强，在军队中还洋溢着被即将来临的胜利所鼓舞的高昂士气。我不止一次参加了他们的党团会议，听他们充满激情的发言。他们表示要全力以赴地去完成任务，那怕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部队得到了补充，增加了许多年轻人，这些年轻人都没有经历过艰苦的战争生活。在部队中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以便培养士兵忠诚于战士的职责、勇敢精神和有理智的主动精神。同往常一样，在面临艰巨的考验之前，在同敌人战斗中立了功的优秀指战员的入党申请书象雪片一样送了上来。

在从白俄罗斯波列西耶到黑海的一千多公里长的阵地上，苏联士兵的高昂战斗激情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进攻力量。这种力量是在春季泥泞时节发展起来的，这次泥泞时节的过早出现，连久居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地区的老住户都感到惊讶。时隔三十年，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那蓝黑色的乌云、烂泥浆似的大地、潮湿带雪的旋风、阴沉沉的早晨以及载重汽车的轮子深深陷进泥水里马达发出的刺耳的吼叫声。

在道路上的雪水未干之前，没有哪个军队敢于采取积极的行动。希特勒统帅部就指望着这一点。它打算利用“气候的间歇”来加强沿南布格、德涅斯特尔、罗马尼亚边境的防线；又把利维尔、捷尔诺波尔、霍亭、卡美涅茨-波多尔斯基、莫吉廖夫-波多尔斯基等城市以及另外一些大的居民点变成战斗的堡垒。我们打乱了德国人的日程表，打破了敌人想要喘息梦想，正是在春季泥泞时节发起了突然的进攻，使得希特勒大失所望。曼施泰因在《失去的胜利》一书中引用了“元首”几句很有趣的话：“什么时候俄国人才停止进攻呢？他们从去年七月就不断地开始进攻了，长此下去是不可能的。”^⑥

但是，进攻仍在继续。这引起了各大洲情报机构的重视。在报纸上和收音机里经常可以看到或者听见一些公正的评论。它们特别强调，苏军在同敌人激烈而残酷的战斗中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水上障碍，他们表现出超人的毅力；苏联统帅部善于利用地形和抓住时机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善于根据条件、地点、时间来部署兵力，迫使对方听从自己的摆布。

美国《先驱论坛报》把我们在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地区的进攻性战役称为“这场战争中一次最令人惊讶的事件”，因为“军事专家们认为，在春季泥泞时节要进行机械化的战争几乎是不可能的。”^⑦大概，这家报纸指的是美国的军事专家如象保尔·汤普逊，他按照一般人的观点，又考虑到德国军队的经验写道：“在机动战的最后一天，在路易斯安那，有一个人说得很对：我真想看看坦克师在这样的土地上是怎样进行战争的。”^⑧ 到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地区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六个苏联坦克集团军、几个独立坦克军团和机械化军团在满是泥浆的田野上奔驰、追赶敌人，切断了他们的退路，包围了敌